

从三级到三级

冯 渊



霜叶 官学明 摄

小学四年级，我转入望江县清华小学。红小兵刚改名叫少先队员，我一下子当上了旗手，胳膊上戴着三道杠，到父亲单位也舍不得摘下。父亲说，不在学校就不要戴了。我舍不得，小声咕哝，摘掉还要戴上，麻烦，费扣针。

“不麻烦。”父亲在供销社百货柜组，经营烟酒日杂，扣针有的是。

学校并没有升旗仪式，旗手是虚衔。这个虚衔是学校唯一一个公办教师指定的。他五十多岁，喜欢抽烟，常叫我帮他买424香烟。

“香烟为什么叫424呢？”

“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‘东方红一号’发射成功。卷烟厂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香烟就取名424。明白了？”

“可是，卫星上天跟抽烟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别‘可是’了，拿好这一块钱，明天给我带两包424。”

“大前门”“424”，都是好香烟，好香烟紧俏，一般人只能买到“东海”和“胜利”。

三级教师

脱下“三道杠”大概十年，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。有一天去同事宿舍玩，他见我来，忙收拾桌上文件。我本没在意，一遮掩，倒引起了好奇。见藏不过去，他将文件一摊，原来是职称申报书。

“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”我跟他是一同一年毕业分配来的，平时跟他聊得最多，自以为他是学校同事中颇能说话的一人。

“这种事，我怎么好跟你说。”他奇怪地看着我，狗多骨头少，一条狗寻到骨头，难道还要告诉另一条狗？多么简单的道理。

我去找校长。校长递过一份申报书：正准备找你呢，来了正好，赶紧拿去填好。

校长的儿子在我班上，我教他化学。

表格填了没多久，我就是一名三级教师了。那个证书是县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，淡绿色塑料封皮，很厚实。

现在学历普遍提高，没有三级教师了，最低是二级。我说自己从三级起步，要费一点口舌，才能讲清楚原委。

一级教师

二级评得颇为顺利，因为顺利，几乎没有留下记忆。

我的一个同学在另一所初中教书，他拿到二级证书就开始规划评一级。但凡聊天，他必将话题引到工资、职级、待遇。他家在一个大村子里，那里出过几位举人。有的人家到现在还藏有《纲鉴易知录》。他家没有书，只有一个病恹恹的老娘，整日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
有一次我实在听烦了，就说：“你离退休还早着呢，急什么呀。”

“你不懂，没有规划就要错失机会。”

他果然每次都抓住了机会。别人踩空一脚，步步落下，一起毕业的，退休时数他工资最高。

我是调到城里后才评的一级。因为调动，有些备课笔记丢在老家，学校让申报时，我只能一边申请特许后补；一边打电话给千里之外的老家，让父亲将材料打包挂号寄来。

一大包材料很快收到。我打听到职称评审办公室，抱着材料走进那幢大楼。接待员斜着眼睛拦住：“补什么补，没有资格就不要报。”

那是盛夏，我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汗水一大滴一大滴掉在地上，就像多年以前我在田埂上拉车或挑秧的样子。我想辩解什么，又无从辩解，水滴扑簌簌落在胸前，后来我才意识到，那不只是汗水，还有眼泪。

他终于放我进评委审读材料的会议室，敲开那扇门，一股沁凉扑面而来。空调开得太足了，烟雾缭绕，恍若仙境。

递上材料，回去等了几个月，没有评上，白忙活一场。

过一年再报，糊里糊涂评上了，那一年，我刚好工作十年。

高级教师

过了几年，又要评高级。填表，考试，最后是答辩。

这是在南京。答辩安排在一所宾馆。我推门进去，很幸运，是我认识的两位前辈。

一位前辈瘦削斯文，他说，你不仅要报高级，还要报特级，我愿意用我瘦弱的肩膀，为你撑起一片天空。

另一位前辈是山东人，在新疆待过多年，性格豪爽，嗓门纤细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只讲了大概两分钟，他接过话头，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方才收

工，满面红光，一身大汗。

走吧。你走吧。结束了，纤细嗓子的前辈说。

瘦瘦的前辈看着我，微笑不语。后来我跟资历比我老的朋友复述瘦前辈的话，表达我的感动。平日并无多少交集，他为何这么看重我，这么郑重地鼓励我？而且采用特别诗意的句式。

老友回了三个字，“你信他。”

我那一年评上了，说是破格的。

正高三级

我读初中时，职称评审刚刚恢复。聚餐，年龄相仿的教师坐满一桌，没有评上职称的，趁着酒劲发牢骚，评上的就辩驳，说着说着，两人动起粗来，大家评理拉架，又相继卷入战斗，最后，一桌人躺倒在桌子底下。这是真事，就在我读书的那所学校。

那时教师收入最低，笑话里少不得一顿编排，说，三个教师分两分钱，分不开，一路吵嚷，来到店铺，买一盒火柴，一根根数清火柴杆，三等分，好巧不巧，多了一根，给谁都不平均，有人提议，那就当众划掉吧，谁来划这根火柴呢，三个人又吵了起来。

我听着这样的笑话，还是填报了师范专业。毕业之后，职称评审已成行业规范。

除了职称，还有各种荣誉、头衔要评比，什么“教坛新星”“学科带头人”“特级教师”“拔尖人才”，等等，设置这些“台阶”的本意是为了激励人的成长，但是这些职场上的成长台阶，就像搁在路中间的水泥墩一样，太突兀了，人人都要主动、被动地攀爬一番。在南京的最后一年，我申报特级教师，没有通过。2009年元月，我离开南京的教育系统，到上海的出版社上班，终于逃出了苦海。我想：评上特级

教师，在出版系统也没用，再好的裁缝也不能做厨师。

不料没到两个月，人事部门就通知我参加出版资格考试。出版资格评审，初级和中级采取的是考试制。考过了，就能获得相应层级的职称，几乎没有其他因素干预。我每个周末去延安西路听课，接受培训的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我当了二十二年教师，在听众里就显得成熟一点。老师说，像你这种老同志，考90多分就行了。九月份我参加考试，两门课都考了一百四十多分。终于拿到了中级出版资格证。

世事难以预料，由于其他原因，还没正式注册成为责任编辑，我又回到了教育系统，又要沿着这些石墩子磕磕碰碰往前走。

近年来，职级划分更为详细，高级职称（副高）细分为五六级，正高级职称分为一二三四级。

评上高级职称之后，内部升级要容易一点，我是何时由七级升为六级的，已经不记得了，应该没有什么烦难手续。但是六级升五级要难一点。五级是副高里的最高层级，名额总是有限，单位一般会按照年资排序。有一年，终于轮到我有机会申报，坐在单位小会议室里述职，五六人待选，只有一个名额。女性居多，她们退休早，按照年资递进，一年一人，有人算下来，发现自己无望，当场就落泪了。我虽然选上了，想到那个盛夏自己不断滴落的汗水和泪水，就觉得很对不起她们。

前几年，我在职称和荣誉上没有任何进步。许多老朋友很为我抱屈，说，你如果一直留在南京，早就评上了。

对这种莫须有的推断，人们总是选择宁可信其有。我知道这是善意的鼓励，不由得想起钱锺书笔下汪处厚夸大他在南京的房产、李梅亭虚报的闸北的洋房，反正都被日本战火烧光了，查无实据，过过嘴瘾。

“我又不是奔着这些才努力工作的。”“是啊是啊。”我辩解，朋友附和，两个人说的都是真话，又似乎都是假话。

后来，我跌跌撞撞，总算通过了正高评审。有次与另一位老师出远门支教，接待的人指着他向对方领导介绍说，这是哪里来的某某专家，又指着我说，这是哪里来的某某专家。然后，特别介绍那位仁兄，说，他可是正高里的天花板，正高三级。

我本来以为终于修成正果了，谁知转眼就碰到了天花板。

不久前，单位发布了三级申报通知。我思前想后，没有报。这世上，除了职级，还有多少有趣的事，我已经耽误了太多。

再过几年，我在公园里散步、打太极拳，或者遛狗，总有机会碰到其他老头，如果有老家伙对我说他过去的行政级别或者职称职级，我会说一句“失敬，失敬”，马上走开。

如果有个老太太来跟我搭话，我会不会小声告诉她：我可是正高三级，正高里的天花板啊。然后，许多老太太从亭子里、假山后、树林间跑出来，哇哦，三级呀！她们惊喜地围着我，一个个笑成了雪中的红茶花。

为了这些虚拟的老太太，我还得努力？

